

侯外庐的治史路径*

兰梁斌

【提要】“理论与实际的统一”是对侯外庐治史路径的高度概括。侯外庐通过翻译和研究《资本论》，接受并掌握了唯物史观，奠定了历史研究的理论基础。在中国社会史和思想史研究中，他创造性地提出治史路径的多条原则：从经典原著出发掌握唯物史观，以社会史研究为前提解释思想史，结合史料使古代社会普遍规律的理论中国化，探究中国历史的特殊规律，防止理论运用的教条化等。从原著出发掌握理论，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史料、现实的双重统一，重视中国历史的实际和特殊性，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批判地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仍是值得继承的马克思主义史学遗产。

【关键词】 侯外庐 社会史 思想史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治史路径

目前学术界对侯外庐史学成就和学术思想的研究成果比较突出，近年来代表性的成果和观点有：方光华主编的《侯外庐学术思想研究》着重总结侯外庐的中国思想史研究方法与成果；^①张岂之指出，侯外庐将中国思想史置于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基础上，开创侯外庐学派，对推动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作出了重要贡献；^②瞿林东认为，侯外庐强调史学工作者的修养，提出在搜集材料的基础上发现规律性，注重在人才培养中发扬民主及马克思主义史学民族化等重要论述，对史学理论和历史学科建设有重要意义。^③张岂之主编的33卷本《侯外庐著作与思想研究》出版，使侯外庐的著述得到系统整理，为深入总结侯外庐留下的史学遗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④笔者因参与该书的校对整理，故希望在史料整理成果的基础上，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史料关系的视角，深入探讨侯外庐历史研究的道路、原则、方法和特点等治史路径，以深化侯外庐史学思想的研究。

一、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形成独特的治史路径

五四时期，唯物史观传入中国，推动了中国史学的进步。侯外庐在李大钊的影响下，通过阅读布哈林的《唯物史观》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确立了科学的理论基础。李大钊强调“搞理论应从马克思

*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侯外庐与20世纪中国史学研究”(项目编号:18XZS003)的阶段性成果。

① 方光华主编《侯外庐学术思想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

② 张岂之《侯外庐先生中国思想史研究的特色与贡献》，《光明日报》2016年1月6日。

③ 瞿林东《侯外庐在史学理论与学科建设上的贡献》，《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5期。

④ 侯外庐的著作除《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中国思想通史》等得到较好的整理外，其他大量著作、时政评论、书信序跋、史学理论和方法方面的论文等多散落于全国多处档案馆、图书馆及私人收藏中，有逐渐散佚的风险。2010年以来，在张岂之主持下，力图全面收集、校勘整理出版侯外庐著述，2016年由长春出版社出版33卷本《侯外庐著作与思想研究》。本文在写作中利用了此次学术整理的成果，但在注释中仍尽量按原刊物和出处进行注释，以保持史料的原始信息。

恩格斯的原著入手”^①并抱憾中国没有完整的《资本论》译本,这对侯外庐产生了较大影响。侯外庐决心以翻译《资本论》为起点,真正确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对历史发展必然规律的信念。1927年,侯外庐赴巴黎大学求学,聆听了布格莱讲授的唯物史观课程,精读了《剩余价值学说史》,并将主要精力集中于翻译《资本论》,最终于1937年完成了《资本论》第一卷的翻译工作。侯外庐翻译《资本论》的最大收获,是接受了唯物史观、社会形态及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奠定了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思想界围绕着“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展开论战。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将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引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一次提出中国古代同样存在奴隶社会,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史一般规律的普遍意义,对侯外庐产生了深刻影响。侯外庐正是受到郭沫若的影响开始转向史学研究,并把郭沫若看作是指引他“学习和研究中国历史的老师”。^②他后来回顾自己研究古史的经历说“一是步着王国维先生和郭沫若同志的后尘,二是继承亚细亚生产方式论战的绪统。”^③通过对中国社会史论战的观察,侯外庐发现这场论战存在两大缺点:一是缺乏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素养;二是缺乏可信的史料作为依据。为了克服这两大缺点,他自觉地追求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扎实史料结合的科学路径来推进中国历史研究。1934年,他撰写了第一篇史学论文《中国古代社会与老子》,正式将自己的学术重心转向历史研究。从1935年夏开始,他“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解释中国的社会史与思想史”,^④先后撰写了《社会史导论》《中国古典社会史论》等论著,逐渐探索出有独特个性的中国历史研究的科学路径。

侯外庐研究中国历史的突出特点,是自觉地将自己从研读《资本论》等经典著作中掌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贯彻到探究中国历史具体问题上,并在具体研究中提炼出有规律性的原则,形成自己独特的治史路径。他说“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特别是它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和方法,说明历史上不同社会经济形态发生、发展和衰落的过程;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以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之间的辨(辩)证关系,是我五十年来研究中国社会史、思想史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⑤侯外庐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从事中国社会史和思想史研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治史路径。

第一,对社会史和思想史展开平行研究,以社会史研究为前提解释思想史。侯外庐是从研究中国社会史开始步入史学领域的,《中国古代社会与老子》和《中国古典社会史论》都着眼于探究奴隶社会史。他的社会史研究关注社会经济形态,强调社会史必须从研究经济学开始,而研究社会经济形态的基本路径,是依据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特殊结合关系引起的生产方式支配地位的变化,来判定一个时代的社会形态、社会性质,进而研究这个时期的历史特点。他指出“研究历史,首先要知道生产方式,根据生产方式来区别某一社会的经济构成,因为生产方式决定着社会性质。反之,如果不应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特定历史时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化以及由此引起的生产方式的变化,就难以自然史的精确性去判明这一时代的社会性质,揭示历史的规律性,历史研究也就失

① 侯外庐《韧的追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14页。

② 侯外庐《韧的追求》,第224页。

③ 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自序”,第4页。

④ 侯外庐《韧的追求》,第67页。

⑤ 侯外庐《我是怎样研究中国思想史的》,《历史教学问题》1982年第4期。

去了最基本的科学依据。”^①

侯外庐坚持从生产方式入手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演变。在研究奴隶社会过程中,他始终坚持弄清楚马克思著作中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谨守考证辨伪的治学方法及将马克思主义关于古代发展规律与中国古代散沙般的资料相结合等基本研究原则。^②在对封建社会的研究中,他强调以法典化作为断定历史分期的标准,将中国封建化过程划在战国末至秦汉之际。^③依据马克思关于土地私有制缺乏“可以作为了解全东方世界的真正的关键”的观点,分析中国自秦汉以来封建社会土地国有制问题,认为皇族垄断的土地国有制形式是中央专制主义的经济基础。他通过分析所有权、占有权和使用权的差异,提出封建社会土地为皇族地主(国家)所有,其他阶层并无所有权,仅有占有权或使用权的土地国有制的观点。^④

正是在对中国社会史进行系统研究的基础上,侯外庐对中国思想史的研究独辟蹊径,开辟出社会史与思想史相结合的研究路径。社会思想是社会存在的反映,社会思想产生的根源必须从社会存在中探究。侯外庐研究思想史的突出特点,是将思想史研究建立在社会史基础上,对思想史进行社会史的解释。他注重考察每种思想学说与历史时代的联系,坚持在社会史研究基础上考察社会思潮的变化和理解时代特点,认为“社会历史的演进与社会思潮的发展是相一致的”^⑤故努力探究社会历史的演进与社会思潮的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将社会史和思想史结合起来平行研究,以社会史为前提解释思想史,是侯外庐治史路径的重要特点之一。

第二,强调社会经济发展和思想史演变的辩证关系。社会经济的发展固然支配思想的发展变化,但思想意识的生产属于社会分工的特殊部门,因而思想本身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集中表现在思想的继承性上。侯外庐指出“任何一个时代的任何一种思想学说的形成,都不可能离开前人所提供的思想资料。应当说,思想的继承性是思想发展自身必不可少的一个环链。”^⑥

侯外庐还批判了庸俗进化论将人类的进化看成是直线向前的简单化观点,强调思想发展的曲折性和复杂性。他认为“正象历史向前发展中总会出现曲折反复一样,人类认识的长河也不会是直线前进的。因此,在思想史上并非所有新的范畴、概念都是趋近客观真理的思想变革,有的甚至还可能是它的反面。”^⑦考察思想上新旧概念范畴的交替,关键在于具体分析不同历史条件下思想家的实际思想内容,深刻认识思想发展的曲折性和复杂性,不能简单认为后代的思想一定是前进的。历史上相互对立的学派在批判对方过程中,往往或多或少地吸收对方的思想来丰富自己。思想家的思想中存在着理想与现实、言辞与实质内容的矛盾,言辞往往掩盖了思想的真实内容。他指出“统治阶级的著作家往往以思想的普遍性形式来掩蔽本阶级的狭隘利益;而代表被压迫阶级的进步思想家则往往借用对历史的回忆或是对未来的憧憬,表示他们对于黑暗世界的抗议。”^⑧因此,要具体分析思想家早中晚期思想的发展过程及他们的阶级立场、政治观点与思想内容之间的矛盾。

① 侯外庐《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自序”,第9页。

② 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自序”,第4—7页。

③ 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页。

④ 侯外庐《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的问题》,《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上册,第238页。

⑤ 侯外庐《史林述学》,《文史哲》编辑部编《治学之道》,齐鲁书社1983年版,第140页。

⑥ 侯外庐《史林述学》,《文史哲》编辑部编《治学之道》,第141页。

⑦ 侯外庐《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上册,“自序”,第12页。

⑧ 侯外庐《史林述学》,《文史哲》编辑部编《治学之道》,第143页。

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侯外庐治史路径的重要表现

历史研究仅有科学理论指导远远不够,还必须将科学理论与丰富史料紧密结合。在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运动中,侯外庐提出要结合中国历史丰富的材料,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理论中国化,并总结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他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理论虽给研究中国历史提供了“金钥匙”,但不能生搬硬套,因为马克思、恩格斯主要是以西欧历史作为论述的基础,所以经典理论需要继续在中国引申和发展。^①正是在这种灵活的理论运用意识的指导下,侯外庐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到具体的中国历史研究中,提出了许多创新性观点。

第一,强调要从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出发,准确理解理论原意,并避免教条地运用理论。侯外庐在评论中国社会史论战时指出“论战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没有很好消化,融会贯通,往往是以公式对公式,以教条对教条……即缺乏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修养而高谈阔论书里的社会性质,是跳不出梁启超、胡适‘整理国故’的圈套的。而要提高自己的理论修养,就应当先把外文基础打好,从经典著作的原著中掌握观察问题的理论和方法。”^②他通过翻译和研究《资本论》掌握了唯物史观,为其历史研究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他强调“防止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条化和庸俗化。如同不能简单地给每一种思想体系贴上某个经济范畴的标签一样,绝不能简单地给每一种哲学体系贴上‘唯物论’或‘唯心论’的标签。”^③

第二,在理论运用过程中应将史料作为基本的立脚点,并借鉴考据学成果,准确解读史料,避免空谈理论。《中国古典社会史论》的写作动机萌发于社会史论战时期,当时学界存在忽视史料、公式化应用理论、形式上占有史料、缺乏正确的方法处理史料等问题。为避免这样的问题,侯外庐“力求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古代史料结合起来,作统一的研究。一方面是为了使历史科学中关于古代社会规律的理论中国化,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使经典作家关于家族、私有财产、国家等问题的研究成果,在中国得到引申和发展”。^④故此,侯外庐充分利用王国维等研究甲骨文的成果。在研究亚细亚生产方式时,侯外庐把“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思想,同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材料结合起来做进一步的研究”,建立在殷墟卜辞等史料的解读和与“古典的古代”的比较基础上,最后得出结论:“中国古代从氏族或农村公社进入文明社会的路径,与西方不同。”^⑤他在撰写《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时,立足于“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研究问题,分析问题”的基础上,“严格进行对文献的考订与审查”,“实事求是地究明‘古人用语的实在所指’”,“使观点与材料统一起来,实事求是地分析各种历史问题”。^⑥

侯外庐等人在编纂《中国思想通史》过程中,除坚持社会存在与意识形态之间的辩证关系的原则,把思想家及其思想放在一定的历史范围内分析研究之外,从中国丰富的史料出发是其始终坚守的另一个原则。他在撰著过程中阅读大量原始材料,辨别真伪,确定时代,校正文字上的讹误衍夺,甚至动手辑

① 侯外庐《史林述学》,《文史哲》编辑部编《治学之道》,第147页。

② 侯外庐《韧的追求》,第224—225页。

③ 侯外庐《我是怎样研究中国思想史的》,《历史教学问题》1982年第4期。

④ 侯外庐《韧的追求》,第117页。

⑤ 侯外庐《韧的追求》,第232、233页。

⑥ 侯外庐《韧的追求》,第266、269页。

集已经佚的著作,尽可能采用精校的本子。作为历史研究的基础,要在史料考证辨伪等方面下功夫,不可随意选择取舍史料,应充分利用学界整理的出土文字资料和实物资料,注意文字古今含义的差异。“历史科学要求实事求是的研究,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渲染,以免失之毫厘,谬以千里。”^①

第三,在普遍规律指导下探寻中国历史的特殊规律,是侯外庐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途径。“研究古代社会,要依据古代国家发展的一般规律,同时也要研究各个类型的特殊规律,只有对具体的事物作具体的分析,才能找出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②在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中,侯外庐承认恩格斯论人类社会的一般规律适用于中国的同时,也注重研究中国的特殊规律,“研究古代,不可把‘古典的’和‘亚细亚的’看成一件东西,在一般的历史规律上,我们既要遵循着社会发展史的普遍性,但在特殊的历史规律上,我们又要判别具体的社会发展的具体路径。”^③

正确处理理论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之间的关系,是侯外庐治史路径的重要特点。离开特殊性,普遍性不复存在,但看到普遍性,也不应忽视特殊性,这突出体现在其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研究。侯外庐通过对史料的详细分析,认为东方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并不是古典的、封建的、近代的三种社会形态之外的特殊形态,它与古典的古希腊古罗马处于同样的阶段,都属于进入文明社会的奴隶社会阶段。它也并不是一个过渡阶段,因为一切文明社会都存在过渡期。亚细亚的古代与古典的古代是“同一个历史阶段的两种不同路径”^④不同的是亚细亚生产方式支配的东方,受地理环境、宗教等因素的影响,比古典的古代成熟早若干世纪,内部的具体路径和特点不同,“‘古典的古代’就是从家族到私产再到国家,国家代替了家族;而‘亚细亚的古代’则是从家族到国家,国家混合在家族里面,就是所谓的‘社稷’。”^⑤中西古代经历了同样的社会发展阶段,这是普遍规律,但中西在文明起源的具体路径上并不相同。侯外庐强调探寻中国历史的特殊规律,是为了“应用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总结中国悠久而丰富的历史遗产”。^⑥故此,他特别注重发掘唯物主义和反封建正统思想的优良传统。如在汉代思想史研究中,他批判经学中的唯心主义,认为汉代经学是反映封建统治阶层意志的“正宗神学”,“把自然的天合同于宗教的‘天’,用曲解自然规律的手法来为封建秩序辩护”。^⑦司马迁思想中虽包含循环论内容,但他是“中国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伟大思想家之一”。^⑧

强调学术研究贵在自得、自省,科学探索的精神和自我批判的勇气密切结合,是侯外庐不拘泥理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保障。在经典理论的理解、社会史和思想史的研究中,侯外庐从不人云亦云,而是将史料与理论结合,提出独到的学术观点。他在亚细亚生产方式等问题上与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郭沫若等有分歧,但这既不影响他们之间的友谊,也不影响他们对中国历史走向的总体判断和对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理解。侯外庐认为通过批评,能够启发思考,提高学术水平。他清醒地意识到“不敢自谓我们的研究就没缺点和错误,而是出于学术工作的责任

① 侯外庐《我是怎样研究中国思想史的》,《历史教学问题》1982年第4期。

② 侯外庐《韧的追求》第240页。

③ 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自序”第6页。

④ 侯外庐《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之研究与商榷》,《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上册,第56页。

⑤ 侯外庐《韧的追求》第235页。

⑥ 侯外庐《韧的追求》第327页。

⑦ 侯外庐《中国封建社会前期的不同哲学流派及其发展》,《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上册,第371页。

⑧ 侯外庐《司马迁著作中的思想性和人民性》,《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上册,第390页。

心,不得不对一些突出问题有所指陈。”^①在坚持学术见解的同时,愿意接受批评,充分反映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崇高的学术品格。

三、“理论与实际的统一”治史路径的启示

“理论与实际的统一”是侯外庐对自己治史路径的高度概括,也是他毕生史学研究的追求,具有重要启示。

首先,“理论与实际的统一”要求运用马克思主义才能科学揭示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乾嘉学派及古史辨派,虽然在史料考证上取得重要成就,但都不能科学揭示中国历史规律。侯外庐的史学成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取得的。他强调理论学习的重要性,指出史学界关于历史分期问题、农民战争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等重大历史问题的研究和讨论,都和大家共同学习与研究历史唯物论及政治经济学是分不开的,“经验证明,不重新学习历史唯物论,不注重学习政治经济学,并由此注重研究社会经济史,历史科学是不可能向前发展的。”^②他认为研究历史从实际出发,具体掌握材料是对的,但不能忘记原则性、规律性,“脱离了正确理论指导”就“脱离了正确的方向”。无论是调查研究,还是通晓史料,如果没有科学的理论分析这些材料,没有理论的指导,就可能“掉到史料堆里为史料而史料,为考据而考据,像清朝的乾嘉学派那样”。^③他强调“我在历史研究中所注重的研究方法,相当程度取决于我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的认识。”^④

侯外庐在李大钊影响下走向马恩原著的研究,并在郭沫若影响下力图做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延长工作”。^⑤他对亚细亚生产方式进行的深入解释及取得的突出成绩,得益于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任继愈指出“侯外庐先生最早翻译了马克思的《资本论》,他对马恩著作下过功夫,他是从源头上接触马克思主义较早的一位史学家。他的学术优势是从第一手原著入手,他所受联共(布)教科书的影响较迟,也较少。因此,他的著作中教条主义、形而上学的缺点也较少。”^⑥

其次,“理论与实际的统一”涵盖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史料的有机统一,是侯外庐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路径。侯外庐强调“要从马克思主义那里找研究历史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绝不是要我们把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词句当成抽象的公式和套语,去任意剪裁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也不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词句去代替对于历史实际的具体研究。”^⑦要避免唯理论是从的窠臼,就要在理论指导下充分占有史料。侯外庐在强调理论指导的同时,认为研究任何问题都必须详尽占有材料,没有材料做支撑,纯粹搬弄一些抽象概念,主观任意地虚构理论的态度和方法,不仅违背科学研究态度,而且最终也做不出任何成绩。“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向反对的另一种科学研究工作上的轻率态度,就是有些人对历史事例和实际问题不下苦功搜集和占有材料,不进行独立的艰苦的研究,只是

① 侯外庐《韧的追求》,第328页。

② 侯外庐《提倡科学上的诚实态度》,《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3期。

③ 侯外庐《关于学习历史的方法》,张岂之主编《侯外庐著作与思想研究》第24卷,长春出版社2016年版,第853、841、843页。

④ 侯外庐《韧的追求》,第91页。

⑤ 侯外庐《韧的追求》,第230页。

⑥ 任继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侯外庐先生》,张岂之主编《中国思想史论集》第2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2—23页。

⑦ 侯外庐《实事求是 搞好史学研究工作》,《历史教学》1979年第1期。

一味图省事地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变成套语,套在他们所研究的事物上。他们以为只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套语来把自己贫乏的历史知识尽快地构成系统,然后就可以自豪地去欣赏自己的功业。”^①

侯外庐认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内部存在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也都没有正确处理理论与史料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史料的正确关系是“从实际出发,是要以事实为根据,而不是离开事实去空想,这是我们的基本要求。但同时,它也包含另一方面的意思,那就是要站得高一些,思想性要强一些,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鸟瞰全局,全面地掌握历史规律。”^②在史学研究中,理论和史料是相互依存的关系,没有理论指导,史料是零散的,缺乏抽象和概括,但没有史料基础,理论就成为空洞的概念,没有生命力,因此,“正确的方法应该是理论与实际的统一”。^③这是侯外庐治史的基本路径。他将其概括为“掌握大量史料,并且对史料经过仔细审查,然后用马列主义观点分析材料,得出符合实际的科学结论来。”^④

最后,“理论与实际的统一”要求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抗战建国等现实需要相统一。侯外庐从来不做为考据而考据的书斋式的学术研究,而是与现实革命斗争的需要结合,从历史研究中找到并论证中国未来的出路。他指出“伟大的抗战建国时代,正是中国学术开足马力的前进时代。学术研究缓慢地落后于抗战军事,这是一个大遗憾。”^⑤所以,要使理论的研究适应“现在和将来的中国民族和社会的需要”。^⑥毛泽东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命题后,马克思主义者和进步知识分子发起了“学术中国化”运动。侯外庐在《理论与现实》创刊号发表《中国学术的传统与现阶段学术运动》一文积极回应。他鉴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数千年历史很少研究的现实,提出“我们要批判地接受中国文化古代的优良传统”,^⑦强调要用马克思主义批判地总结中国的历史遗产。因此,侯外庐提出的“理论与实际的统一”的治史路径,不仅是理论与史料的统一,而且是理论与革命斗争的现实需要的统一,彰显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学术性和革命性的结合。

总之,侯外庐“理论与实际的统一”的治史路径,对当代中国历史研究仍有重要启示。坚持唯物史观,从原著出发掌握理论,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史料、现实的双重统一,重视中国历史的实际和特殊性,反对唯理论是从,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和民族化,批判地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与建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高度契合,在当前和未来的史学研究中大有可为,需要认真研究、继承和发展。

(作者兰梁斌,西北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邮编:710127)

(责任编辑:敖凯)

(责任校对:张舰戈)

① 侯外庐《在严格要求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红旗》1961年第19期。

② 侯外庐《关于学习历史的方法》,张岂之主编《侯外庐著作与思想研究》第24卷,第840页。

③ 侯外庐《关于学习历史的方法》,张岂之主编《侯外庐著作与思想研究》第24卷,第840页。

④ 侯外庐《怎样造就社会科学研究人才》,《文汇报》1980年6月28日。

⑤ 侯外庐《中国学术的传统与现阶段学术运动》,《理论与现实》第1卷第1期,1939年4月。

⑥ 编者《创刊献辞》,《理论与现实》第1卷第1期,1939年4月。

⑦ 侯外庐《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文风书局1946年版,“自序”,第1页。

SUMMARY OF ARTICLES

One Hundred Year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 View from the Great Legacy of the Party-Building Enterprise // Wang Weiye

The great legacy of the party-building enterprise is the source of creativity for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 which contains rich content , promoting party members' outstanding spiritual characteristics. Over the course of the past one hundred years ,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 carrying forward the great party-building spirit , has led the Chinese people to a path of great achievements. This experience has crystalized into a great spirit , one that bound the spiritual genealog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s. To continue this great journey , we should continue to carry forward the great party-building spirit. As we establish a correct view of party history , we will not only strengthen the study of the spiritual genealog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 but also steadfastly combat historical nihilism.

On the Programmatic Document That Establishes a Correct View of Party History // Wen Dashan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s July-First important speech not only concludes the glorious history and great achievements of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but also summarized the rich connotation of the great party-building spirit. It puts forward nine aspects of the important experiences to learn from the past and to project to the future. It is a benchmark for comprehensively examining the history of the party in the past century. Taking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s the fundamental method , the speech closely sticks to the main theme and essential mainstream of party history in the past century. Not only does it adhere to the grand historical view , but also effectively counters historical nihilism. In doing so , it offers a model for adhering to the correct view of party history as well as embodying future direction and inspiring meaning of socialist development. It is a programmatic document for establishing a correct view of party history.

Hou Wailu's Approach to Historical Studies // Lan Liangbin

"The unity of theory and practice" is a high-level summary of Hou Wailu's central approach to historical studies. Through translating as well as examining *Das Kapital* , he accepted and mastere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 which laid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his historical studies. In his study of Chinese social history and the history of thought , Hou creatively proposed many principles for historical studies , including , but not limited to , comprehending historical materialism from classics , using social history as a way to decode history of thought , Sinicizing universal principles on ancient society in combination with primary sources , exploring special natures of Chinese history , and preventing the dogmatization of the application of theory. He insisted on grasping theory from original works , unifying Marxism with historical records as well as reality , recognizing the reality and particularity of Chinese history , achieving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theory , and critically inheriting the excellent culture from traditional China. All these principles are still worth inheriting as the legacy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